

赵曦 著

中国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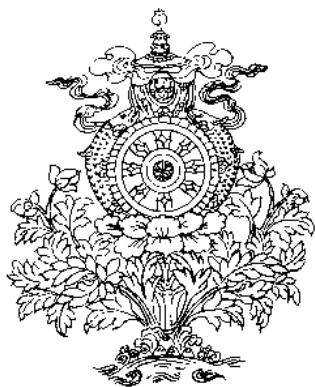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西藏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赵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藏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赵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5004-5183-0

I. 中… II. 赵…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西藏 IV. F1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5987 号

责任编辑 王半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和赵曦教授在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同事和同好，多年来经常在一起交流与切磋。2001年夏天他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邀请作为学术总负责人参加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农牧民增收与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将去西藏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询问我的意见。我十分赞同并以一本有关英籍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斯基的传记供他阅读。我意不是要他学习和接受马氏功能学派的观点，而是希望他能参考马氏从事研究的方式。所谓马氏的研究方式就是指他坚持扬弃过去学者习用的在“安乐椅上的遥研”的研究方式，坚持“眼见为信”的原则，到社会的底层去，和最原始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共尝他们的喜怒哀乐，做到彼此心灵深处的交流和感应，从而树立起帮助和理解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五年一下就过去了，赵曦教授不懈地按眼见为信的原则在西藏进行工作，不知走了多少路，接触了多少藏族同胞，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也不知度过了好多不眠之夜，把自己亲身体验和仔细观察到的西藏社会经济现象加以整理、提炼，归纳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奉献给人们。

在出版了《中国西藏扶贫开发战略研究》和《21世纪西藏农牧民增收的途径》两部专著之后，赵曦教授完成的《中国西藏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他对西藏经济发展战略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本书除了鲜明的表现出作者一贯的严谨治学精神、基础

工作作风很扎实、文章写得很实在以外，还有以下的特色：

首先赵曦教授很尊重以往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成果的应用，重视理论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只要以往的成果是经过详细和周密地调查，所提出的观点或原则又符合恩格斯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应用于自然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① 他均加以采纳，譬如本书中赵曦教授引用了瑞典发展经济学大师冈纳·缪尔达尔关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缪氏多年实地研究和考察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现凡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会出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一些发达地区会向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或输入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这显然对发展中地区是有利的，缪尔达尔称这种现象为“扩张效应”；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原材料也会往发达地区流动，缪尔达尔称这种现象为“回流效应”。两种效应作用的结果，往往促进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加剧，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赵曦教授在考察了西藏发展的现实后，认为缪氏的理论也适合于西藏，也可能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问题在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赵曦教授认为只有加大外力的推动，强调西藏地区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中央支持和社会援助的方针，以此作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基本前提。这说明赵曦教授在尊重实践原则的同时也非常尊重为实践检验证明其符合实践的理论。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同于一般的规划和计划，它的主旨在于理清西藏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路。如何按中央提出国家在经济社会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导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

统筹协调西藏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人与自然诸方面发展和相应的重大战略措施。因此这个研究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总体政策性，而不是去设计各种具体指标及其量化，不去追求面面俱到。从全书的布局可以看出，作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搞清楚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正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分析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总的战略措施，首先是制度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地区布局调整与重点地区开发，赵曦教授特别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这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除此以外，人口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措施。可见赵曦教授是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理清西藏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路，抓住西藏未来发展多方面的战略措施来展开论证，而不陷入繁琐的具体事件的叙述，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雷起荃

2005年6月于成都

目 录

序言	雷起荃 (1)
第一章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	(1)
第一节 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态势	(1)
第二节 和平解放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7)
第三节 西藏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	(24)
第二章 西部大开发与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	(52)
第一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	(52)
第二节 经济跨越式发展决策	(59)
第三节 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途径	(67)
第三章 资源、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与制约因素	(78)
第一节 资源、经济的基本状况	(78)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84)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98)
第四章 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104)
第一节 制度、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104)
第二节 西藏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约束	(111)
第三节 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115)
第五章 生产力布局调整与重点区域开发	(126)
第一节 区域空间发展的理论与模式	(126)

TCC 90/02

第二节	生产力布局结构的变迁	(140)
第三节	“ $\perp$ ”型布局结构与经济开发重点	(147)
第四节	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	(156)
第六章	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167)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发展	(167)
第二节	西藏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与主要障碍	(186)
第三节	教育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与实现途径	(197)
第七章	人口发展与城镇化建设	(214)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214)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223)
第三节	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与途径	(230)
第八章	农牧区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	(239)
第一节	基本背景与难点问题	(239)
第二节	贫困分布的现实态势	(245)
第三节	反贫困战略的总体思路	(259)
第四节	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途径	(267)
第九章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92)
第一节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态势	(292)
第二节	生态环境建设的严峻形势	(301)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	(307)
参考文献		(330)
后记 雪域圣地印象		(332)

第一章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人民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极端落后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是西藏社会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统治实现千年跨越的历史进程，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西藏地区具体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伟大历程。全面总结 50 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对于深刻体会 21 世纪初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基础、系统研究切合西藏实际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实施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 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态势

旧西藏是中国乃至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曾经有人断言：“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人类分布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侧。”^① 在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到近代已经成为与世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极端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它扼杀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阻碍社会进步，使西藏陷入极度贫穷落

^① 转引自庄永福：《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西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

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加上历史上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挑拨，整个西藏社会动荡不安，奄奄一息，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一 经济剥削残酷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①，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庄园领主或充当代家奴，遭受强制的乌拉差役、租税和高利贷三重剥削，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个农奴转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两藏银的债。^②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

^① 克：藏民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一克相当于一亩，15克相当于一公顷。下同。

^② 索林：《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

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账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60%以上的农牧民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债务。

二 政治压迫野蛮

占旧西藏总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农奴和奴隶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无任何政治权利可言。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

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①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作为“农奴主的会说话的工具”，屈服在农奴主的强权之下，失去了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思想和人身被紧紧地桎梏着。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三 宗教桎梏沉重

宗教和寺院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惟一的意识形态和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庞大的势力和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层僧侣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实

^①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行僧俗官员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据 1959 年统计，在全西藏 330 万克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 121.44 万克，占 36.8%；贵族和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府则分别占 25% 和 38.9%。哲蚌寺当时就拥有 185 座庄园、2 万名农奴、300 多个牧场和 1.6 万名牧民。据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 2700 多座寺庙，12 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 12%，大约有 1/4 的男子出家为僧。1952 年拉萨 3.7 万城镇人口中，竟有 1.6 万名僧人。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比例极高的僧人和众多的宗教活动，聚敛和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正如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指出的，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①。

四 发展水平低下

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经济状况充分表现出农奴制的基本特点，即“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②。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和寺院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无穷无尽的消耗及其对人们的精神奴役，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极其落后的状态。农奴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长期陷入黑暗、贫困的深渊。

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牦牛踩

^① 梅·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第 39、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97 页。

场脱粒。在少数地方，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烧荒肥田”的原始耕作方式。农作物产量极低，粮食产量只有种子的四至十倍。1952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8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125千克。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畜牧品种单一退化，牧畜品种的改良、草场的利用和畜产品的加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畜牧生产的要求，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全区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也十分落后，现代工业更是一片空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没有，旧西藏交通险阻，行路艰辛，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横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残留下来的几条铁索桥，没有一座能通车的桥梁。英国人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将汽车拆了用牲畜驮到拉萨。能源状况落后，至1950年解放前夕，仅有一座125千瓦的水电站断续供电。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其低下，加上农奴主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境地。仅就首府拉萨来说，民主改革前城区只有两万多人，城周围住在破烂帐篷里的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户。监狱不供犯人伙食，戴着手铐、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无家可归者冻饿倒毙街头的凄惨情景处处可见。

帝国主义的人侵加重了西藏人民的灾难，也加深了西藏社会的矛盾，使本已破败不堪的西藏社会更加难以以为继。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英帝国主义人侵西藏，大肆烧、杀、抢、掠，并通过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疯狂掠夺资源，大量倾销商品，对西藏进行殖民控制和剥削。与此同时，他们在西藏少数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信，寻找代理人，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广大农奴在内外双重压迫和剥削下生活

急剧恶化，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西藏社会危机四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①。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多次指出：西藏“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②。这样，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打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就成了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和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二节 和平解放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人民自立，给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希望。中央人民政府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西藏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并通过推动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和措施，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羁绊，跨越了几个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和面貌，大幅度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 民主革命时期（1951—1977）

（一）西藏和平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

^①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73 页。

^②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载《中国藏学》（北京）1991 年第 1 期。

渐具体,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拟定的《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西南局负责“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西南局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电示精神,研究提议:“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领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西南局的计划,并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1950年1月15日,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在重庆接见了十八军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下达了进军解放西藏的任务。

西南局根据各方面调查了解的情况分析,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较前增大”,“除继续加强进军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并拟定4条方针上报。1950年5月17日,中央批复西南局并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所拟4条,指出加强政治争取完全必要。中央精辟地分析了西藏社会的特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人民普遍信仰喇嘛教;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挑拨,西藏统治集团采取非爱国主义态度;上层中有分化,达赖喇嘛有某种程度的内向是可能的;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极其穷苦,但统治阶级所用的宗教维系力仍很强;西藏地形、气候对进军作战有困难。加之历代中央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西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需要有个了解过程。针对以上情况决定对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办法,即主要通过谈判的方法解决西藏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增进藏汉民族团结,而且符合广大西藏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愿望。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和谈并以武力对抗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扫除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障碍。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西藏统治集团迅速分化,摄政达扎被迫下台,达赖喇嘛亲

政，西藏地方当局派出谈判代表赴京，经过双方代表六轮的正式谈判，在充分协商后，于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结束了旧中国对藏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西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是西藏由黑暗的农奴制度社会跨越封建社会地主经济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的良好开端，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二）对西藏经济的扶持

西藏和平解放后，进藏部队根据中央指示，采取重大措施进行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发展西藏经济。1952年5月，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无息贷款270多万银元。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拖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发放无息贷种、贷粮和无偿提供生产工具。西藏工委还向噶厦无偿提供了30万银元用于兴办粮行，用高进低出的办法平抑物价。1954年中央政府拨专款80亿元（旧币）救济江孜灾民，进藏干部也捐款近13万银元。国务院拨款240亿元（旧币）修复江孜至日喀则及亚东的公路。中央投资2.6亿多元巨资，加上数万名进藏部队官兵的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了康藏、青藏公路。兴修水利，建立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